

# 苦鬥與壯遊 王雲五評傳

金炳亮 著

中和出版  
OPEN PAGE

中

# 序一

林家有

王雲五是歷史文化名人，祖籍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與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是同縣人。王雲五的父親是外國洋行在上海的買辦，所以他出生在上海，幼年雖回廣東香山故鄉生活幾年，他懂粵語、喜歡粵菜，但因他出生在上海、成長在上海，做事和成名也在上海，上海人的精明、包容、善思、刻苦的品性對他的成長影響很大。雖然廣東人的敢為天下先、勇於開拓和善於創造的歷史文化對王雲五也有影響，但這並不是王雲五成長的主要原因。

王雲五沒有接受過高等學校系統的文化知識和科學技術的教育，也沒有出國遊學接受西方英、法、德、美各國和東方日本的科學培養，只是一個靠自學、勤奮苦練成才的文化人。他教過書、講過學、做過研究、寫過書、編過書，還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成為一位遠近聞名的文化奇人。王雲五在文化上的成功，誠如金炳亮在《苦鬥與壯遊：王雲五評傳》書中所說，不是靠天

分，也不是靠恩賜，而是靠他的「苦鬥」品格和「不服輸」的奮鬥精神。

歷史是講過去的人和事，但歷史畢竟與現實不同，所以對待歷史上的人和事，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觀點和方法去審視歷史上的人和所發生的事。每一個人都離不開他生活的時代和具體的歷史條件，評判歷史人物和事要從歷史的角度去探討人的一生，說明他成功和失敗的緣由。王雲五在經營海峽兩岸商務印書館時出版了中國大量文化典籍和文化教育的讀物，對於傳承中國五千多年的優秀傳統文化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不是全盤西化論者，也不是食古不化的頑固的封建傳統的守護人。他主持編的書，他寫的文章，雖也有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但他不認為中國「百事不如人」，也不主張「議古論今」，更不認為「今不如昔」。晚年他雖也有幾事哀歎，因為國民黨丟了大陸，對共產黨執掌中國的大權心有不甘。他時有流露出對國民黨無能的指責，也有反共的言行，對於外來文化也有新的思考。這就是歷史，歷史可以造就人，但歷史也會傷害人、誤會人。這一切王雲五都經歷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王雲五的商務印書館經營困難，他焦慮不安。他一會到南京，一會又到北平、重慶，一會又回上海，來來往往，一晃多年過去了。在萬般無奈之下，王雲五由文化界投身政界。1938年4月，王雲五作為文化界的代表，被選為蔣介石國民政府第一屆參政會參政員，開始投入政壇。1946年6月，王雲五還出任南京國民政府經濟部長，並兼任最高經濟委員會委員，蔣介石想通過王雲五來穩定金融和經濟，可是這時王雲五已經59歲了，已

力不從心了，蔣介石對他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次年王雲五又擔任國民政府政務委員和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在錯誤的時間，作了錯誤的選擇。國民黨政權已經行將就木，垮台即在眼前，是留在南京為蔣介石腐敗政權看守、送終，還是一走了之，王雲五選擇了後者。1948年11月，他攜家人飛往廣州，次年又移居香港，1951年3月又由香港飛往中國的臺灣，定居臺北。王雲五這一走到了臺灣，蔣介石當然高興一陣子，因為他在臺灣天天叫喊反攻大陸，光靠那些拿槍的武人不濟於事，因此蔣介石對於投奔臺灣的大陸重量級文化人給予籠絡和收買，藉此安定人心。如胡適給予「中研院」院長、蔣夢麟給予臺灣新竹清華大學校長、傅斯年則出任臺北臺灣大學校長，王雲五也混了個「考試院」副院長、「行政院」副院長的頭銜。這就決定王雲五這一生從喜劇開始，而以悲劇告終的命運。

政治無情，人有情。王雲五家鄉中山市人民對王雲五的「苦鬥」精神，自學成才的經歷至今仍津津樂道，對於他離開大陸後至1979年8月在臺北過世前未能回故鄉一趟，感到有點惋惜。對於像王雲五這樣的兩面性人物，過去大陸、臺灣學術界評論不一，各說各的話，不過這是學術問題，學術應該允許，也應該進行自由討論，求得一個合理的、公允的解釋，給人們一個正確的啟導。

金炳亮長期在出版行業工作，對於王雲五經營商務印書館的經歷發生興趣，這是自然而然的反應。近年來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重視對王雲五資料的搜集，並在2006年於廣東人民

出版社出版《文化奇人王雲五》一書。之後他又對王雲五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歷經數年終於寫就這部《苦鬥與壯遊：王雲五評傳》。本書的初稿和二稿，我都認真地讀了多遍。本書史料豐富，行文流暢，觀點有創新，評判據事而議，結論謹慎。本書對王雲五的人際關係也有較多陳述，是一部具有學術性和可讀性的成功之作。我為金炳亮在人物研究中的方法和審視問題的角度以及評判人物的原則表示讚賞和肯定。

人的一生是很複雜的，每個人生命背後都有許多故事。一個人之所以成功與失敗，抑或他之所以這樣而不那樣，這裏面有許多原因。現在的人來研究歷史人物，得到的只是相對的結論，而非絕對真理。當然，知己固不易，知人則更難，在人物研究中不可過於武斷；要做到這一點，研究者的學養固然重要，但研究的方法和視角也很重要。金炳亮這部王雲五評傳，講王雲五的主要經歷，評王雲五的成功和失誤的原因也比較恰如其分。祝金炳亮成功完成王雲五評傳的寫作和出版，並期盼他繼續努力，不斷有新著出版，為文化建設作貢獻。

(作者係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 序二

陳萬雄

評傳作者金炳亮兄約聚，並面囑為新稿撰序。能第一時間奉讀此稿，因關乎商務印書館的史事，欣然拜讀。近 500 頁的煌煌巨著，專心致志，也足足花了兩個星期才算讀過一遍。至於囑咐撰序，閱前看後，都覺躊躇。心忖金炳亮兄之意，囑託撰序者，無他，以本人曾經服務香港商務印書館愈三十年，是商務中人，會對商務印書館的館史有所認識和研究，何況又是專治中國近代史的。不過金炳亮兄還是誤會了。

本人之所以從事出版工作，並入職香港商務印書館，自有認識和理解到近代中國的出版業、尤其是商務印書館，在中國近代文化教育的重要影響的因素。另外，雖然專治的是中國近代史，然而，對近代中國的出版和新聞業，卻未認真做過專題研究。至於服務商務印書館愈三十年，對館史的研究，亦措意不多，只停留在治近代史者和任職者的認識水平。當然，既服務長達愈三十年，對商務印書館的立館宗旨和一貫的企業精神，還是有一定的

體會和認識的。這些體會和認識，前後在商務印書館 90、100、110 和 120 年館慶紀念中，屢有表述。

通讀此稿，實獲益良多。除增進了對王雲五的全面認識外，更加深了對商務印書館在近代中國出版業和近代史地位的更完整的認識。故不揣淺，談談我的一些讀後感，而實未副金炳亮兄和讀者作為序的期望。

金炳亮兄是一位資深的出版人和出版經營者，深諳編輯出版的門道和出版經營的要領，是出版業的局中人，內行人。所以在闡述傳主和商務的出版思想和經營理念，尤見鞭辟入理。從這個角度，此書的面世，書內不少篇章，可供主管和從事出版業者、甚至是文化企業經營者參考和借鏡，有助打破常糾纏在文化與市場取捨中的迷惑。出版業和出版工作，尤其像商務印書館這樣性質的出版社和圖書經營者，兼具文化教育的強烈理想與努力不懈的企業經營的追求，如不諳其特有的企業性質，實無法彰顯其歷史的地位和貢獻。在這方面，著者書中着墨甚多，是同類研究著作中的一大特色。

挽近幾十年，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文化思想的範疇，無疑是其中的顯學，但研究重心頗見偏頗，所謂文化思想的研究，多側重主導者的言論而輕忽社會大眾的普羅意識。如商務印書館及其重要人物之在近代中國的學術、文化、教育、社會思潮以至近代企業創造等方面，不僅對社會的上層，對大眾社會，都產生過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茲舉一例以證之，商務印書館連同中華書局等出版社，其出版的教科書，實主導和塑造了近代中國的國民意

識，其影響可謂大矣、廣矣、深矣！如此這樣關乎社會大眾的啟蒙和普羅意識，長時間內，研究是相當零落的，因此也反映不出近代歷史發展的全貌。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關於商務印書館及其人物的研究漸多，但從某種意義來說，大部分的研究，仍然是作為企業史去處理的。近十年，關於商務印書館及其人物的研究勃興，而且能跳出企業史的研究格局，而將之納入中國近代史發展的大脈絡中去考察，這是一種明顯的進步。2017年8月，為紀念商務印書館成立120週年，由北京大學和商務印書館合辦的「商務印書館與中國現代文化的興起國際學術研討會」，就是一個具體而微的明證。是次研討會的研究論文，不說精粗之分，詳略之別，但省觀所發表的題目，視野之廣，研究角度之新穎，以至能緊扣中國近代史的大課題而作出的闡述，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可以預見，以商務印書館為首的近代出版業的研究，將成為日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項新熱點。金先生此著作的出版，雖云以王雲五為傳主，以商務印書館為脈絡，但其內容實逸出傳主和商務印書館本身，而輻射到中國近代史發展的大流中。從這角度而言，這部著作又不啻是中國近代出版史和文化教育史的導讀本。

此書傳主王雲五先生，從商務印書館本身館史而言，貢獻是大的，卻又是一位爭議性不少的人物。何況作者對傳主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不以商務印書館和出版史為限。對於傳主，其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比之他視為至友的胡適之一樣，更是「譽滿天下，謗亦隨之」的歷史人物。中外古今，評價歷史人物，是最

困難的。何況中國近代，風起雲湧、瞬息變幻的變局，歷史人物的評價更形困難。對王雲五這樣毀譽參半的人物，明顯見到，作者比之以往的研究，力求客觀、本着實事求是的態度去撰述的。至於作者對傳主的評議，自當仍爭議難免。關鍵在於著作的研究和撰述，是否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漸能擺脫一時的偏見，回歸客觀。

(作者係香港出版總會永遠名譽會長、歷史學博士)

# 目 錄

序一 林家有	i
序二 陳萬雄	v
引言 海峽兩岸的王雲五	001
第一章 少年磨難	017
一、上海，香山	020
二、半工半讀，自學成才	030
第二章 與書結緣	041
一、買書狂人	042
二、播種圖書館	048
三、教書、譯書、著書、編書	056
第三章 商務印書館歲月(上)	063
一、胡適推薦	064
二、編譯所的改革	074
三、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	101

四、創設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 115

五、「四」「百」「萬」 118

#### 第四章 商務印書館歲月(中) 135

一、出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 136

二、出國考察 151

三、推行科學管理法 164

四、劫難中的苦鬥 173

五、文化復興大業 192

#### 第五章 商務印書館歲月(下) 215

一、以香港為大本營的戰時出版(1937年10月至1941年12月) 217

二、以重慶為大後方的戰時出版(1941年12月至1946年4月) 234

三、上海淪陷之後的艱難留守(1937年11月至1946年9月) 242

#### 第六章 走向政壇 255

一、初任公務 258

二、參政議政 263

三、欽點入閣 278

四、幣改失敗 290

#### 第七章 臺灣政壇「大寶」 309

一、「國大之寶」 310

二、「博士之父」 315

三、行政改革	318
四、無黨無派？	321
<b>第八章 重振臺灣商務印書館</b>	<b>341</b>
一、回歸出版	342
二、老樹開新枝	347
三、舊夢未了	374
<b>第九章 教學、研究及著述</b>	<b>385</b>
一、黃金十年（1905—1915年）	386
二、「重理粉筆生涯」	392
三、讀書與研究	395
四、寫作與著述	402
<b>第十章 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b>	<b>421</b>
一、家庭生活	422
二、經濟狀況	431
<b>第十一章 朋友圈</b>	<b>447</b>
一、胡適	448
二、張元濟	456
三、高夢旦	468
四、蔡元培	475
五、孫科	483
六、朱經農	488

第十二章 做人做事及其他	497
一、社會活動家	498
二、雲五圖書館	503
三、基金會	506
四、偶像的哲學	512
附錄一：王雲五大事年表	523
附錄二：王雲五著譯書目	550
主要參考書目	555
後記	559

## 引言：海峽兩岸的王雲五

1979年4月10日，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在人民大會堂臺灣廳舉行職工座談會，曾任新中國出版總署署長的胡愈之、文化部部長的茅盾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老同志參加，會上提議與臺灣商務印書館建立聯繫，交流出版物，互相通信，探親訪友。

8月13日，王雲五的老朋友、一直住在上海的潘序倫（1893—1985）在香港報紙刊文，內有「弟兄和合，重見端倪，故園春意盎然，桃李成蔭，尚望早日歸來，共襄『四化』大業，使我中華民族，巍然卓立於天地之間」。<sup>①</sup>此文的「統戰」意味（潘序倫時任上海市政協委員），表明中共對王雲五的態度已發生重大變化。

但是王雲五等不到這一天了。

就在該公開信發表次日，王雲五在臺北病逝。歷史，沒有再為王雲五重返大陸的「壯遊」提供這樣的機會。在20世紀80年代胡愈之、茅盾、葉聖陶這些當年曾經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與王

---

<sup>①</sup>《潘序倫書壽王雲五》，載《潘序倫文集》，立信會計出版社2008年10月。

雲五共事多年的老人相繼去世之後，海峽兩岸的兩個商務印書館握手言歡的故事，只能留待他們的繼任者來講述了。

當 1948 年底王雲五匆匆離開大陸，他絕沒有想到是一去不復返。1949 年的大風大浪將海峽兩岸阻隔為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王雲五時刻想着「反共復國」，重返大陸；然而他能做的，只是千方百計地復興臺灣商務印書館；他以為他承繼了商務印書館的血脈，然而，他認定的「那一個」商務印書館早已終結在「民國時期」的歷史書寫之中了。

1954 年，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由上海遷到北京（之前已設駐京辦事處，編審部和出版部隨後也相繼遷往北京），實行公私合營，改組為高等教育出版社（仍保留商務印書館的牌子）。1957 年，商務印書館恢復獨立建制，由文化部主管。出版範圍為：「以翻譯資本主義國家的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方面的著作為主，並出版中外文的語文辭書。」<sup>①</sup>

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也相繼創建了商務印書館。

1988 年，海峽兩岸和港新馬的五家商務印書館的負責人實現歷史性的會晤。繼王雲五之後擔任臺灣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的張連生，到北京訪問了商務印書館。

在很長一段時間，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大陸似乎忘記了王雲五這個人物的存在。不過，可能是因為四角號碼檢字法太過普及和深入人心，王雲五的這項發明不但沒有消失，而且發揮了

---

<sup>①</sup> 《商務印書館 110 年大事記》（1958 年），商務印書館 2007 年版。

極為重要的作用。早在 1950 年 8 月，還在私營未改組之前的商務印書館，就在上海編寫出版了《四角號碼新詞典》。之所以加個「新」字，是表示新中國的「新」，是區別於「舊中國」而言的；然而內容卻是舊版王雲五編著的《四角號碼學生詞典》的修訂增補。作者的署名自然不可能是王雲五了，而代之以虛化的「商務印書館編輯」。《四角號碼新詞典》到 1962 年 5 月已出至第六次修訂本，僅在上海（全國還有其他印刷點）就印行至第 29 次，累計印數報紙本 584.55 萬冊，高級紙本 43.17 萬冊。

「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出版活動基本停了。《四角號碼新詞典》也不再重印和修訂再版。1971 年，周恩來總理在聽取文化口出版組的工作彙報時說：「王雲五編的四角號碼字典為甚麼不能用？不要因人廢文。一個人有問題，書就不能用了？它總有可取之處嘛！」「要懂得水有源樹有根。……《新華字典》也是從《康熙字典》發展來的嘛！編字典可以有創造，但創造也要有基礎。」<sup>①</sup>這可能是 1949 年之後中國大陸第一次公開提及王雲五的名字。要知道，即使《四角號碼新詞典》暢銷多年，王雲五的名字也是作為一個忌諱，被「輕輕抹去」的。

既然周總理發了話，《四角號碼新詞典》繼續印行。在《新華字典》和《現代漢語詞典》正式出版發行之前，《四角號碼新詞典》實際上發揮了這兩本全民工具書的作用。1977 年，在《四角號

---

<sup>①</sup>《周恩來選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67-468 頁。

碼新詞典》第 8 次修訂時，王雲五的「舊四角號碼」被「新四角號碼」所取代。不過，此後，音序檢字法和部首檢字法逐漸取代了四角號碼檢字法。2008 年，以「商務印書館辭書研究中心」名義修訂的第 10 版《四角號碼新詞典》僅印了 1 萬冊。四角號碼檢字法及相關工具書此後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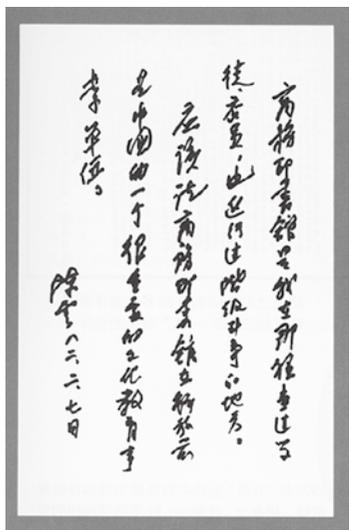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雲五在商務印書館時的多位同事，成為新政權的高官。其中陳雲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但陳雲早年在發行所，而王雲五在編譯所，兩人工作上沒有交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陳雲也沒有提及過王雲五。王雲五在編譯所時的幾位同事胡愈之（1896—1986）、茅盾（沈德鴻）（1896—1981）、鄭振鐸（1898—1958）、周建人（1888—1984）、葉聖陶（1894—1988），都做了新中國的文化事業領導者。胡愈之，1914 年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理化部做練習生，20 世紀 20 年代實際負責《東方雜誌》編輯事務，1928 年離開商務印書館赴法國留學，1931 年回國重返商務印書館，1932 年 10 月商務印書館復業後主編《東方雜誌》，1933 年離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胡愈之是首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後任文化部副部長。茅盾，原名沈德鴻，1916 年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20 年代初在編譯所主編《小說月報》，將其辦成新文學運動的主要陣地；1925 年離館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陳雲

茅盾曾任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鄭振鐸，1922年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創辦《兒童世界》雜誌，1923年接茅盾主編《小說月報》雜誌；在編譯所工作期間與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元老高夢旦之幼女高君箴結婚；1927年離開商務印書館赴英國留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鄭振鐸曾任文化部副部長、文物局局長。周建人，1921年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譯自然科學著作，直至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又短期再入商務印書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建人曾任出版總署副署長、高等教育部副部長。葉聖陶，1915—1916年在商務印書館附設尚公小學任教員，1923年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1928年任《小說月報》主編，1930年離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中央文史館館長。

胡愈之、茅盾、鄭振鐸、周建人、葉聖陶都是王雲五主政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時的多年同事，也是王雲五頗為倚重的編譯所業務骨幹。相互之間，他們應該都不陌生。可是由於兩岸阻隔，



1982年2月7日，陳雲為紀念商務印書館成立八十五週年題詞：「商務印書館是我在那裏當過學徒、店員，也進行過階級鬥爭的地方。應該說，商務印書館在解放前是中國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業單位。」

更是由於意識形態的高牆封鎖，他們之間不但完全不通信息，而且囿於各自的政治身份，也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談到對方。即使偶爾談及對方，海峽兩岸的當年同事對於同一事件的描述也多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以相對與王雲五交集較多的胡愈之為例。對於 1930 年 6 月 23 日下午在巴黎與胡愈之的會面，王雲五曾在回憶錄《岫廬八十自述》中有簡短的憶述：「是日下午，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助理編輯胡愈之自鄉間來訪。愈之以編譯生考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嗣在東方雜誌助理編輯，寫作甚有進步，前歲自費來法國留學，研究國際法。」<sup>①</sup>雙方談了些甚麼則沒說。對於胡愈之在「一·二八」事變後商務印書館復業時擔任復刊的《東方雜誌》主編半年即離職之事，王雲五在寫於 1954 年（其時胡愈之已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總署署長）的《關於東方雜誌的回憶》中，稱自己因為「愛才」，「乃依序擢胡氏為主編」；「惜其擔任此席後，所收外稿，甚至自撰社論，頗多不合『國策』，我不得不加以勸告。有一次不得已撤去其已發排之一文，胡氏為此深滋不



胡愈之

<sup>①</sup> 《王雲五文集》陸（上），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87 頁。

悅，遂請辭職。」<sup>①</sup> 這段回憶與胡愈之、茅盾等的回憶基本一致。而王雲五寫於 1971 年的《重印東方雜誌全部舊刊五十卷序》在回顧雜誌歷史時，對胡愈之曾任主編之事則隻字未提：「本志首任編輯人為杜君亞泉，次為錢君智修，歷時最久；復次為李君聖五……」。<sup>②</sup>



茅盾

胡愈之寫於 1978 年的回憶錄提到那次在巴黎的會面。「我在法國遇到過王一次。他來找我。他說商務要他做經理，他認為原來的老先生對付工人沒有辦法，他向商務提出讓他周遊世界一次，專門看看大工廠，專門考察管理工人的辦法。……我看他『考察』的目的就是想用甚麼手段來更加殘酷地剝削工人和壓迫工人，這就是他對商務印書館的『貢獻』。」<sup>③</sup> 胡愈之回憶，他接手主編《東方雜誌》，與王雲五有約在先，就是商務當局不能干預具體編輯事務，但才幹了半年，王雲五就不讓幹了，因為 1933 年元月推出的新年特輯《新年的夢想》得罪了國民黨。而接任胡愈之擔任《東方雜誌》主編的李聖五是汪精衛的紅人，後來加入汪偽政府，當了漢奸。所以胡愈之說王雲五「就這樣用《東方雜誌》投靠汪精衛去

① 《王雲五全集》(10)，九州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42 頁。

② 《王雲五全集》(19)，九州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60 頁。

③ 胡愈之：《我的回憶》，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9 頁。

了」。<sup>①</sup>

在對王雲五的總體評價上，一方面，胡愈之肯定其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改革，認為「從 20 年代初期商務印書館在書刊出版的方針上，作了一些比較進步的改革」<sup>②</sup>；一方面又斷言：「從歷史上看來，王雲五是商務印書館走向衰弱和反動的主要罪人」。<sup>③</sup>

與胡愈之充滿意識形態政治色彩的描述相比，茅盾的回憶則要具體而生動得多。20 世紀 20 年代初，為了淡化《小說月報》的激進色彩，王雲五試圖另辦《小說世界》，將前者淘汰不用的那些「禮拜六派」「鴛鴦蝴蝶派」的稿件重新啟用，茅盾（沈德鴻）將這一行為指斥為「王雲五及其同夥之卑劣無恥」<sup>④</sup>。對於王雲五在「五卅」運動中捐助 100 元創辦《公理日報》，茅盾也沒有刻意迴避。<sup>⑤</sup>對於王雲五在商務印書館工潮中的表現，茅盾多有直觀具體的描述。

相比之下，學術界則客觀理智得多。1985 年 4 月出版的《大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濟傳》是中國大陸早期研究商務印書館和張元濟的重要著作，書中稱「商務印書館前後有三位獨當一面的人：夏瑞芳、張元濟、王雲五」<sup>⑥</sup>；認為「商務在五四後終於完成了走向學術著作等高級讀物的轉變過程」，對於王雲五主政商

① 胡愈之：《我的回憶》，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0-141 頁。

② 胡愈之：《我的回憶》，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81 頁。

③ 胡愈之：《我的回憶》，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1 頁。

④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15 頁。

⑤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04 頁。

⑥ 汪家熔：《大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濟傳》，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43 頁。

務印書館編譯所之後的改革成效作了肯定。<sup>①</sup>

在王雲五去世之後的十年間，兩岸堅冰逐漸打破，出版界和學術界開始逐漸注意到王雲五。1979—1989年的十年間，以王雲五為主題的論文發表共有28篇，說明學術研究已開始起步。20世紀90年代，兩岸交往頻繁，1990—1999年以王雲五為主題的論文共發表99篇。<sup>②</sup>1997年，上海的學林出版社編輯出版《舊學新探——王雲五論學文選》，這是中國大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最早出版的王雲五著作。1999年，上海書店出版社又出版郭太風著《王雲五評傳》，是為中國大陸出版的第一部王雲五研究專著和王雲五傳記。這些研究的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強調王雲五的文化貢獻和成就，同時儘可能淡化其意識形態色彩。90年代出版的權威辭書《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王雲五」詞條較好地反映了這些研究成果：

王雲五(1888—1979)，中國出版家。原名之瑞，號岫廬，祖籍廣東香山(今中山)，1888年7月9日(清光緒十四年六月初一)出生於上海。1906年起，先後在上海同文館、中國公學等校教授英文。1909年兼上海留美預備學堂教務長。1912年，先任南京臨時大總統府秘書，後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事。1913年任中國公學大學部教授。1917年起，

① 汪家燊：《大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濟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頁。

② 申衛群：《1979—2013年以王雲五為主題研究文獻的計量分析》，載《貴圖學刊》2014年第4期。

在上海從事編譯工作，並創辦公民書局，開始出版商生涯。1925年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並編出《王雲五大詞典》等書。1930年春，出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抗日戰爭爆發後，開始投身政界，連任4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政協代表。1946年，任國民政府經濟部部長，「制憲國大」代表。次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長，積極支持反共內戰政策。1948年5月，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財政部部長。為挽救瀕於崩潰的經濟，在蔣介石授意下，提出幣制改革方案，以金圓券代替法幣，限制物價，並獲通過實行。但不久即遭到失敗被彈劾下台。1949年4月去臺灣，先後任臺灣當局「行政院」設計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考試院」副院長，「行政院」副院長，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等職。1979年8月14日卒於臺北。著有《物理與政治》《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四角號碼檢字法》等。<sup>①</sup>

在時光的流逝中，意識形態終將退去，而文化的意義會愈為突顯，並將永存！精明的王雲五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在晚年要回歸學術、重返出版；他的學生和門徒也明白這個道理，因此在評價老師時基本不涉及政治。比較具代表性的是王雲五的學生金耀基撰寫的兩段文字。

---

① 《中國大百科全書》（簡明版）第9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4981-4982頁。

其一是 1977 年為立於雲五圖書館門廳的王雲五銅像而撰寫的文字：

王雲五先生，號岫廬，公元一八八八年生，先生出身於平凡的學徒，自強不息，以牛馬駱駝之精神，苦鬥不懈，終成一代奇人。先生在學術、文化、政治、教育上獨特之貢獻皆已化為時代共有的資產。惟千百年後，先生仍將被記得他是萬有文庫的主編者，四角號碼檢字法的發明人，現代科學管理之先驅，雲五圖書館的締造人，商務印書館的偉大門士與化身。王雲五三個字已成為一空無依傍的人憑一己之努力攀登社會巔峰的象徵。<sup>①</sup>

其二是 1979 年王雲五逝世後撰寫的墓誌銘：

在此九十二年生命中，正值一非常之時代，雲五先生在人間作了一次極不平凡的壯遊。

先生於學無所不窺，乃罕有之通人。

先生掌館時實行科學管理，開拓文化疆域，發揚國故，輸入新知，網羅全國學術精英，編印四部叢刊、大學叢書、萬有文庫等書，氣魄宏偉，識見深遠。領導書界與新教育連成一氣，出書之多與精，為全國冠。中國讀書人鮮有未讀商

---

① 金耀基：《人間有知音：金耀基師友書信集》，香港，中華書局 2018 年版，第 26-27 頁。

務書者。商務曾四度毀於國難，而先生四度使之復興。故言商務必言先生，先生誠商務之偉大門士與化身也。

無論為官為商，始終不脫書生本色若先生者，真第一等人也。<sup>①</sup>

20世紀90年代之後，隨着編輯出版專業列入教育部學科規劃，大學院系陸續開設編輯出版專業，以及相關研究機構漸多，王雲五的研究逐漸趨熱。2000—2009年以王雲五為主題的論文發表達247篇，而2010—2013年的三年多時間，發表論文已達129篇。<sup>②</sup>儘管王雲五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曾深度介入近現代中國歷史，但從發表論文的刊物來看，以王雲五為主題的論文，其刊發期刊按發表數量依序排在前五位的是《編輯學刊》《編輯之友》《出版科學》《中國出版》和《出版史料》，全部是編輯出版方面的專業期刊。<sup>③</sup>以王雲五及相關出版活動作為研究對象的碩士學位論文為數亦不少。2000年，王建輝的博士論文《文化的商務：王雲五專題研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標誌着王雲五研究進入到一個較高的階段。王建輝著作將王雲五的出版活動放進「一個大轉型的時代」進行考察，認為王雲五是中國「出版近

① 轉引自王壽南編：《王雲五先生年譜初稿》（四），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859-1860頁。

② 申衛群：《1979—2013年以王雲五為主題研究文獻的計量分析》，載《貴圖學刊》2014年第4期。

③ 申衛群：《1979—2013年以王雲五為主題研究文獻的計量分析》，載《貴圖學刊》2014年第4期。

代化的探索者」<sup>①</sup>。書中對王雲五的出版活動從時代背景、(商務)內部傳承、文化創新、與思想文化界的聯繫等多方面進行研究，試圖通過對文獻史料的梳理，「為王雲五尋求歷史的公正」<sup>②</sup>。可惜的是，作者對王雲五在去臺之後重振灣商務印書館的經歷沒有進行研究。1965年，王雲五以近八十歲的高齡，將萎靡不振的臺灣商務印書館建成全灣首屈一指的出版機構，其自譽為是商務印書館的「第五次復興」。這一段歷史，對於王雲五的出版活動而言，無論如何都是不可或缺的。

2002年，王雲五之子王學哲從美國返臺任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加快了王雲五「精神返鄉」的進程。2005年和2007年，王學哲編輯的兩本王雲五著作單行本簡體版《我怎樣讀書》和《岫廬八十自述》，分別由遼寧教育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後者是王雲五晚年寫的回憶錄，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大大突破了過往出版王雲五著作集中於文化和學術的限制，為研究者提供了較為全面的第一手資料。2010年，《王雲五文集》列入國家「十一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隨後6卷11冊的《王雲五文集》陸續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至2015年出齊）。2013年4月，九州出版社推出20卷《王雲五全集》，儘管遺漏了部分重要著作，但編選者盡最大可能保留了所選篇目的原貌，為學術研究的深入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

① 王建輝：《文化的商務：王雲五專題研究》，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40頁。

② 章開沅：《文化的商務：王雲五專題研究·序》，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4頁。

本書書名《苦鬥與壯遊》來自王雲五漫長人生的兩個關鍵詞。王雲五崇尚「苦鬥」，他能由一個沒有學歷、沒有資望、沒有人脈的底層草根，成長為著名的出版家，並在政治、文化、教育、學術等多個領域取得成就，絕非偶然。「苦鬥」是必修課，也成為他終其一生引以為豪的一個標籤。他無數次的演講、寫作都有關於自己「苦鬥」的經歷，許多文章直接以「苦鬥」為題。他曾這樣總結自己的人生：「幸而從小藉苦鬥而養成之習慣，任何挫折，悉視同命運予我之試驗，而以解決難題為無上之自我報酬。職是之故，任何逆境不足以陷我於消極，轉因聽之於天，與求其在我之兩種觀念，往往峰迴路轉，別入新境。」<sup>①</sup>王雲五的學生金耀基是這樣闡釋王雲五的「苦鬥」精神的：「王雲五三個字最生動的意義是落在象徵層次上的。王雲五象徵了一個貧苦無依的人的奮鬥成長的故事。他的成功沒有半點的僥倖，也不是純靠天份，而是憑他的不服輸、不肯認命的戰鬥性格，憑他的『牛馬駱駝』苦幹與堅毅的精神。」<sup>②</sup>

「壯遊」則是王雲五人生的一個寫照。「壯遊」一詞多次出現在王雲五不同時期所寫的詩詞當中。最早是寫於1930年他首次出國考察：「壯遊萬里氣如虹，歷遍河山一藐躬。九國新猷供囊括，五洲奇跡歎神工。」<sup>③</sup>王雲五在政治、文化、教育、學術等多

---

① 《王雲五全集》(17)，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9頁。

② 金耀基：《我所認識的王雲五先生》，載王壽南主編：《我所認識的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第404頁。

③ 《王雲五全集》(20)，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頁。

方面均有所經歷並取得成就，每一個方面，在常人而言，足以成就一個圓滿的人生。這也正是所謂「奇人」王雲五的傳奇之所在。

如果說，「壯遊」是夢想；那麼，「苦鬥」就是實現夢想的途徑。苦鬥與壯遊，這是王雲五「成功學」的基本邏輯，也是王雲五勵志故事經久不衰的核心元素。正所謂：「處世如壯遊，胡為不勞生；壯遊不易得，豈宜虛此行。」<sup>①</sup>

---

<sup>①</sup> 《王雲五全集》(20)，九州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56 頁。



第一章 / 少年磨難





1965年11月14日，王雲五在（臺北）中山同鄉會辦公室（百齡堂）落成典禮上致辭

1967年7月8日，臺北市的中山同鄉會會所，外面車水馬龍，所內人聲鼎沸、名流雲集。這是王雲五80歲生日慶祝會現場。

三天前，王雲五設了一個「局」：為「避壽」躲進了臺北的宏恩醫院。幾乎所有人都知道雲老的身體硬朗得很，從沒聽說進過醫院，而他八十大壽的消息早就在政壇、學界和出版界傳開了。6日上午，「總統」蔣介石到王雲五的寓所祝壽，因為事先沒有通知，王雲五「避壽」的「局」卻把他「一生最好的知己」蔣介石給避開了。

蔣介石為祝壽而題寫的「弘文益壽」四個大字壽幅就擺放在會所壽堂的入口處，寓示着王雲五一生傳奇的最高榮耀。生日慶祝會由中山同鄉會的名譽理事長孫科主持，「副總統」嚴家淦、「總統府」秘書長張群等三千餘賓客到場致賀。王雲五「一襲湖色的綢袍，黑色的皂鞋，他不要人攙，更不要人扶，也不肯坐下來

憩息，一直神采奕奕地在賀客群中打轉」。<sup>①</sup>

這一年，為了慶祝王雲五 80 歲生日，臺灣的出版界、政界和學界早早開始了行動。臺灣商務印書館感念王雲五半個多世紀以來對商務印書館所作出的傑出貢獻，將新建落成的館屋命名為「雲五大樓」。孫科發起募集資金，成立雲五獎學金。政治大學校長劉季洪倡議編輯出版《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嘉新水泥公司捐贈一百萬元新臺幣用作編輯出版費用。

孫科以中山同鄉會名義舉辦的這場生日慶祝會盛況空前，王雲五低調的「避壽」，由此被這高調的盛會沖得幾乎了無痕跡。

這天夜裏，一向睡眠奇好的王雲五興奮難眠，連夜寫就《八十自壽》（五言八十句），回顧自己的一生：

鰥生出寒門，少小苦多病；閉戶從兄讀，平凡無特行。  
遲遲就外傳，輟學因運命；發奮勤自修，早年教學競。  
一衿尚未青，學子咸知敬；邂逅我國父，青睞使觀政。  
服官赴北都，講學操筆柄；一時著微名，解職見真性。  
平日喜潛修，一鳴驚僚友；周旋護法間，誤入是非藪。  
為國矢忠誠，潔身拒利誘；賦閒試筆耕，忝廁書林首。  
苦鬥垂十年，艱難忍釋手；蹉跎廿五春，萬卷孰與偶。  
抗戰參大計，適時抒抱負；訪英遠報聘，西亞友情厚。  
勝利終來臨，協商平壁壘；復員膺特命，迭奏經財技。

<sup>①</sup> 《王雲五全集》（17），九州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 頁。

一度入樞垣，褐衣被金紫；挽危倡改幣，功罪付信史。  
堅辭引咎職，負責當如是；初服幸我還，首先歸故里。  
播遷到臺嶼，賣文為生理；一日五千言，盈盈數十紙。  
宏開「國代會」，言行著口碑；協辦主銓衡，量才玉尺持。  
行政倡改革，半年奠始基；重遊紫薇垣，建議待施為。  
五載多勞苦，掛冠勿遲疑；勉留五六月，重擔終解除。  
奉聘為資政，獻替豈容辭；任教來政大，及門盡研幾。  
十年四博士，碩士二十餘；商館重主宰，半年景物移。  
措施兼三利，一舉復令譽；古物長保管，北遷呈異姿。  
基金宏獎助，舊學與新知；一心為文化，戮力遺居諸。  
八秩猶頑健，寶刀尚無疵；滿懷老益壯，學用到期頤。<sup>①</sup>

## 一、上海，香山

前半輩子，王雲五絕大部分時間都工作、生活在上海；晚年一直在臺北生活和工作。他講上海話，講國語，也講粵語。他明明是廣東人，可是在上海出生長大。在北平、香港、重慶、南京都住過幾年。這種混搭，使得王雲五對於「你是哪裏人」的問候，感到迷惑。

這種情況在他遠離故鄉、漂泊寄零於海上孤島的時候，卻又慢慢變得清晰起來。晚年的王雲五，頗有點「鳥近黃昏皆繞樹，

---

<sup>①</sup> 《王雲五全集》(17)，九州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 頁。

人當歲暮定思鄉」的味道。1960年冬，王雲五擔任成立屆滿一年的中山同鄉會的理事長，為《中山縣志》撰序，為著名鄉賢撰寫《中山縣先賢志略》。倦鳥歸巢，葉落歸根。無論他走過哪裏，漂向何方，他的根，還是在那個曾經叫做「香山」的地方，偉大的愛國者孫中山先生的故鄉，中山縣。

1888年7月9日（農曆六月初一）王雲五出生於上海租界。

上海租界，起始於1842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被迫開放上海等五口通商。1845年，根據清政府上海地方當局與居住上海的英國人簽訂的《上海土地章程》，上海開始出現中國最早的租界。在不斷擴展之下，租界由最初的863畝（0.575平方千米）拓展到48653畝（32.43平方千米），包括公共租界（即英美租界，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33503畝（22平方千米多）和法租界15150畝（10平方千米多），共分中區、東區、西區和北區。今北黃浦、靜安以及虹口、楊浦兩區南部沿江地帶是上海公共租界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分別對應公共租界中區、西區、北區與東區。

經過不到半個世紀的風雨，雖然中間經歷短暫的太平軍圍攻和小刀會起義，但中國近代化的歷史進程在這個中國開埠最早的城市留下了極為濃重的色彩。上海，已從一個封建王朝的舊縣城，發展成為一個初具規模的現代意義上的城市。白天，車水馬龍；晚上，萬家燈火。電車、電話、電報，自來水、公園、報館、遊樂場等等普通中國人聞所未聞的新事物，已然成為這座現代都市必不可少的一個個元素。

王雲五出生和成長的租界就是這樣一個號稱十里洋場的中國最具現代氣息的地方。

位於上海租界核心區域的南京路於 1865 年正式命名。南京路的形成和命名，是上海走向近代化的一個標誌。英國人命名南京路本為紀念給他們帶來



1900 年拍攝的上海租界外灘

莫大利益的《南京條約》，但上海人習慣將南京路稱為大馬路，而將南京路往南與之平行的九江路、漢口路、福州路和廣東路，依次分別稱為二馬路、三馬路、四馬路和五馬路。由外灘往西，與這幾條東西向馬路構成街區的南北向馬路分別為黃浦灘路（外灘）、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四馬路是書店街，「左面有光華、樂群、春潮、北新、啟智，右邊有新文化、現代、群眾、世界、泰東、卿雲。」<sup>①</sup> 在四馬路西至河南路（附近街區俗稱「棋盤街」）交匯處，座落着中國最著名的兩家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在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時光，王雲五就生活、工作在這個中國最現代化的街區，他一生最好的時光、最大的成就就發生在這裏。

<sup>①</sup> 懷瑾：《十七年度中國文壇之回顧》，《申報·藝術界》1929 年 1 月 6 日。

租界名義上是租借之地，事實上卻在中國政府及法律的管轄之外，其一切內部事務均由租界當局設立機構直接管理。公共租界的管理機構是「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另有獨立的司法機構「會審公廨」。法租界的管理機構是「公董局」(Council Municipal)。因此，租界實際上相當於外國人的領地。1853年小刀會攻佔上海縣城後，大量華人湧入租界居住。由於租界相對較為安全，以後凡是戰亂，或其他天災人禍，華人即大量湧入。到1932年，華人在租界已超過一百萬，形成華洋雜居、城中有城的獨特景象。

上海租界與中國其他地方是那麼的不同，當時有人形容「租界內康莊如砥，車馬交馳。房屋多西式，軒敞華麗，有高至六七層者。鐘樓矗立，煙突如林。入夜則燈火輝煌，明如白晝」。還有人形容「一入租界眼界開，此身疑是入蓬萊。若借劉阮今重到，錯認桃花不肯回」。

如果排除租界形成的政治因素，僅從表面上看，上海租界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經濟最繁榮、管理最現代化的地方。最重要的是，這裏工商業發達，市場發育成熟，是名副其實的十里洋場，是冒險家的樂園。在這裏，前有李鴻章、盛宣懷的崛起，後有蔣介石起家發跡，虞洽卿、黃金榮、杜月笙的異軍突起。歷史學家夏東元先生在《盛宣懷傳》中解讀盛宣懷的崛起時說：「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走着非常之路。」

時代，場景，一切準備停當，大幕徐徐拉開，我們的主角要出場了。

王雲五出生在上海，不過，他的家鄉，履歷表上填寫為籍貫的地方，卻是廣東省香山縣永寧鄉泮沙村（今屬中山市南朗鎮泮沙村），與孫中山先生的家鄉翠亨村（原名菜坑村，屬四都鄉）相隔只有十多里，與中國民主革命最早犧牲的烈士陸皓東（1868—1895）是遠房親戚。王雲五稱陸皓東為表兄。



著者走訪泮沙村，與王雲五家族後人交談。王雲五祖屋現已不存，這是其後人在原址蓋的房子，編號：王屋正街一巷6號

筆者於2006年4月6日曾與中山市文化廣播電視新聞出版局的甘建波先生一同前往泮沙村訪問。王雲五的故居現在的門牌編號是泮沙村王屋正街一巷6號，但故居早已傾圮不存，只有進門右側一口廢棄不用的水井為當年原物。現在的房子沒有任何可以顯示王雲五曾在這裏居住的標誌，租住該房子裏的住客也不知王雲五何許人也。

香山縣在宋高宗紹興二十二年（1152）設立縣治，迄今已有800多年，在廣東是一個開發較早、經濟和文化均較為發達的地方。香山毗鄰澳門，離香港也不遠，並有大量華僑散居海外，思

想觀念上較少束縛，更易接受外來事物。如孫中山早年從事革命的檀香山（火奴魯魯）就有許多香山移民，王雲五家族也有許多親戚僑居在此。澳門和香港也是孫中山、陸皓東等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早年從事革命活動的兩個重要據點。



王雲五祖屋舊址門前的水井是當年留下的唯一遺跡

近代以來，香山產生了許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可以說是一個鍾靈毓秀、人才輩出的地方，除前述的孫中山、陸皓東外，還有唐紹儀（民國第一任總理）、鄭觀應（近代著名思想家）、容閔（近代留學生之父）、蘇曼殊（近代著名詩人）等著名歷史人物。有人做過統計，如果以縣為單位，列入《辭海》的30餘位中山（香山）籍名人（全書共收錄2000多名歷史人物）在全國各縣市中名列前茅，這些名人中最知名和絕大多數都是近現代產生的。<sup>①</sup>近代上海開埠之後，香山人大量湧入上海。據學者估算，19世紀中葉，在上海的廣東人有8萬多，而來自香山的有兩萬多。<sup>②</sup>早期來上海的香山人大多在各大洋行工作，家族中人以學徒方式相互幫帶跟學，香山因而成為「買辦之鄉」。在洋行熟悉了生意之道後，許多香山人在上海創辦工商企業，著名買辦、企

① 胡波：《簡論香山名人文化》，《開放時代》2005年（增刊）。

② 熊月之：《上海香山人與香山文化》，載《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與解讀》，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頁。